

# 美国的对中对苏战略与20世纪70年代的三国关系\*

胡晓丽

(山东交通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山东 济南 250023)

**摘要**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几次调整其对中对苏战略,形成了由“一压一和”到“双和”再到“和中抗苏”的变化轨迹。受其影响,中苏关系呈持续对抗状态但避免了大战,且两国在严峻的武力对峙态势下也酝酿、积蓄着改善关系的积极因素。美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战略基点在于如何从中苏关系的现状中渔利,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在20世纪70年代迟迟得不到实现,既使在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后也仍是在低谷中徘徊。

**关键词** 美国;中苏关系;对中对苏战略

**中图分类号** K712.54;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14)07-0119-04

20世纪70年代,从尼克松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到卡特政府末期,十年当中,美国先后实施了“双和”与“和中抗苏”战略。受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中苏关系基本处于持续对抗状态。不过,此间中苏两国并未发生重大军事冲突,而在严峻的武力对峙局面下,两个邻国内部也在酝酿、积蓄着改善关系的积极因素。

## 一、尼克松政府对中对苏战略的调整

1969—1971年,是尼克松上台后酝酿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的阶段,也是美国的对中对苏战略由“一压一和”向“双和”转变的阶段。所谓“一压一和”,是指压制中国、对苏缓和;而所谓“双和”,则是指对中苏两国同时实行缓和之策。

20世纪60年代末,有两个原因促使美国政府着手调整其外交政策及改变其对中对苏战略的走向,即由压制中国、对苏缓和的外交政策基调向同时缓和与中苏两国的关系转变。这两个原因就是:

其一,美苏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随着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不断升级,它在国际、国内都处于十分被动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的盟国及其国内要求停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此时,苏联却趁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在60年代末取得了与美国基本相当的战略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寻求更多的盟友以抗衡苏联。

其二,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边境形势日益紧张。到1967年底,苏联在中苏边境的驻军人数达到25—30万人。从1968年开始,苏联边防军和中国军民在边境地区的纠纷事件不断发生。1969年2—3月,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流血冲突,两国走到了战争的边缘<sup>[1]</sup> (P218-219)。1969年6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老帅基于他们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研判,形成了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sup>[2]</sup> (P7-24)。这一判断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认识。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来,苏联已经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比美国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在苏联的战争恫吓下,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尼克松政府在总统竞选期间和当政之后的试探姿态十分关注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这样,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现实状况及中苏两国的对美政策,就为美国调整其对华对苏政策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1969年1月,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我们的通讯线路将是畅通无阻的”。他后来曾解释说,这是向中国发出的一个含蓄的和解暗示<sup>[3]</sup> (P261)。

\*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2DLSJ02)的阶段性成果。

2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声明,表示愿通过对话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状态,“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sup>[4] [P229]</sup>。珍宝岛事件之后不久,美国领导人便认定事件是由苏联挑起的<sup>[5] [P174-175]</sup>。7月,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中美之间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尼克松又利用环球旅行之机向中国传送友好信息,暗示准备同北京来往,并明确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sup>[1] [P218-219]</sup>。美国这样做,一方面是向苏联发出警告,以制止可能发生的中苏之间的全面战争,另一方面也是借此向中国表示友善,以促进中美和解。9月,尼克松和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要求尽快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0月,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中国,美国决定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基辛格在年终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还说“8亿人民代表着人类的25%,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sup>[6] [P250]</sup>。

1970年1月20日,中断了两年之久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得以恢复。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强调,伟大的、生机勃勃的中国“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表示要采取步骤“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11月到12月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欢迎尼克松派特使来北京,也欢迎他本人来华访问。

1971年4月,中国政府邀请在日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实现了“以小球推动大球”<sup>[7] [P214-224]</sup>。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公布了尼克松将应邀访华的消息。美国迈开了调整对华政策及其对中对苏战略的步伐,开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 二、美国的“双和”战略与三国关系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对中苏两国的外交中大打“双和”战略,并借此战略而在中美苏三国关系中占尽先机。

美国政府以实现美中和解作为实施“双和”战略的起点。1972年2月初,在对国会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尼克松再次确认了他对中国的新政策,强调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人口最多的国家交流的重要性,反对以权宜之计对待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sup>[8] [P11-13]</sup>。同年2月18日,尼克松启程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双方于

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公报郑重声明: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sup>[9] [P311]</sup>。公报显然含有共同针对苏联的意味。以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为标志,中美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明显提升,中美苏战略三角从此形成。

经过反复试探和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这个共同敌人的基础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走向和解。就中国而言,与美国和解的战略意义在于增加了中国面对苏联威胁时的安全感。毛泽东在1972年所说的“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这句话<sup>[10] [P520]</sup>,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战略考虑。就美国而言,改善中美关系既可以遏制苏联,又可以促进美苏间新的缓和,其战略目的在于利用中国制衡苏联,利用苏联害怕中美和解的心理迫其作出较多的妥协。美苏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处的冷战格局以及美苏间的力量对比状况,决定了美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必然性。

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其外交政策的基点是谋求世界霸权,因此,70年代苏美间的全球争霸愈演愈烈。但另一方面,苏联对美政策的基本考虑是竞争与合作并存,认为双方应进行对话和沟通。与之相对应,70年代中国的外交战略重点是,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这样,中苏两国的外交政策中都有与美缓和的成分,这就为美国实施“双和”战略奠定了客观基础;而美国决策者准确认识到中苏两国的外交处境并积极利用它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这又为美国成功实施“双和”战略奠定了主观基础。

美国看准了中苏分裂的契机,采取对中苏两国同时都比较缓和的政策,利用中苏两国的心理以谋求美国的最大利益,使中苏两国在彼此敌视中都有求于自己,从而求得美国“既有茅台酒又有伏特加”<sup>[11] [P471]</sup>。中美苏三国三角关系运行的现实验证了美国“双和”战略的高明之处:中苏两国争相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则在“一视同仁”的政策下占尽了优势<sup>[12] [P189]</sup>。鉴于中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及美国的强大实力,中苏两国都希望能将美国中立于中苏对抗之外而不希望美国与对方接近。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引起苏共中央决策层的严重不安,随后,勃列日涅夫马

上派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同基辛格会谈。基辛格圆滑地表示,他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几乎没有涉及苏联问题,他甚至感到中国最担心的实际上不是苏联,而是日本<sup>[13] [P191]</sup>。1972年2月尼克松成功访华,这再次令苏联高层震动不安。在苏联的邀请下,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双方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条约》、《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及《苏美关系基本原则宣言》等一些条约和议定书。从此开始,直至1978年底,美苏高层间不断的互访和一系列双边协定的签订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局面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1972年4月,有12家美国公司被中国邀请参加1972年春季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11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取消对美国船只和飞机前往中国大陆的禁令。双边贸易额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激增至1973年的8亿多美元。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完成了互设联络处的工作。1974年4月,邓小平赴美出席第6届特别联大,同基辛格商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三国中实力最弱的国家,美苏关系断断续续的缓和不免会加剧中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随时有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以维护美苏关系,苏联则完全有可能更为猖狂地进行战争威胁。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中的紧张气氛有增无减,中苏边境兵戎相见,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世纪70年代末的估计,苏联将国防预算的12%—15%用在了中苏边境的军费开支上<sup>[14] [P94]</sup>。当时的苏联从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同时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一是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炫耀武力;二是不断加强对蒙古的控制,驻蒙苏军剧增;三是向印度提供各种武器,并挑拨印度反对中国;四是扶持越南反对中国,并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从南部直接威胁中国。

总之,20世纪70年代,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正式形成,美国由于强大的国家实力及对中苏关系的准确判断而成功实施了对中苏两国的“双和”战略,从而在三角关系中占了主导地位;苏联出于对美战略及遏制中国的需要而极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被迫向美国作出许多妥协和让步;中国则由于国家实力、中苏对抗及台湾问题等因素而处于相对劣势。

### 三、美国的“和中抗苏”战略与三国关系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中苏战略逐渐转向

“和中抗苏”。由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中国在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相对上升,苏联的战略地位则相对下降,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缓和。

1978年,美国开始酝酿调整对中苏两国的政策,导致这种调整的是美国日益变化了的苏联观。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势力在全球的扩张威胁着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对苏“缓和”的政策在其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卡特政府于是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对苏政策,并着手考虑加强同苏联的竞争,改变对中苏不偏不倚的政策成为势之必然。

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表现就是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4月,卡特总统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向中方表示,美国已下了决心,准备通过谈判消除正常化的一切障碍。7月初,中美双方在北京开始了建交谈判。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公布,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公报强调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特别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任何地区谋求霸权的原则<sup>[15] [P9-10]</sup>。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访问期间,邓小平同卡特总统就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时通知中国方面,卡特总统决定在各种双边问题上把中国和苏联明确区分开来,其中包括出口管制、获得进出口银行贷款资格和最惠国待遇等。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政府更加重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作用,决心把两国的合作扩大到防务领域。布热津斯基指出“苏联对美国构成了战略挑战,而中国没有;苏联固执的行为有利于代理人间接地在战略或地区这两方面强加给我们紧张局势,而中国人没有。因此,美国不能对这两个国家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sup>[16] [P592]</sup>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迈出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第一步。随后,美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装备,包括直升机、高科技电子计算机和通讯设备。1980年底,美国国防部宣布,正式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运输直升机、车辆和电子检测设备在内的辅助性军用装备。

应当指出,在卡特执政后期,不利于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也在孕育之中。比如中美建交4个月之后,1979年4月10日,卡特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的宗旨是“维持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和其它关系”。美国的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中美建交协议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中台湾问题的凸显,中美关系在里根上台前后再次走向低谷。

尽管中美关系中存在着台湾问题这个障碍,但就中美苏三国三角关系的整体而言,1978年至1980年,美苏关系处于低谷,中美关系则相对达到了高峰,而中苏关系仍较紧张。

#### 四、结语

首先,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几次调整其对中苏战略,经历了由“一压一和”战略到“双和”战略再到“和中抗苏”的变化。1969至1971年,美国新任总统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和美苏冷战的战略考虑,抓住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契机,着手调整其对中苏政策。美国政府作出了在对苏有限缓和战略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选择,从而形成了其对中苏两国的“双和”战略。1972至1978年,美国在尼克松制定的对华对苏政策道路上继续前进,借助其对中苏两国的“双和”战略,在对苏外交中打“中国牌”,从而在三角运作中占尽上风。1978至1979年,美国卡特政府的中苏战略调整为“和中抗苏”,其突出表现就是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其次,在此期间,美国因素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两个相互矛盾但又顺理成章的影响,即中苏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持续高度紧张,另一方面又维持了彼此之间的基本和平,换言之就是说,中苏两国尽管持续紧张对峙但并未爆发大战。不过,在1980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冷战思维较重的里根于1981年初走马上任之后,美国与中苏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中苏关系逐渐升温,以及美国在三国关系中的战略地位相对降低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突出了冷战思维,从而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和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使中苏两国在不约而同地疏离美国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需要。此间中苏关系虽尚无改善,但

已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最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考虑得更多的是从中苏关系的现状中渔利而不是真正改善中美关系。美国的这种战略基点也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在20世纪70年代迟迟得不到实现,即使在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后也仍是在低谷中徘徊。

#### 参考文献:

- [1] 韩念龙. 当代中国外交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 [2] 熊向晖. 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师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 [A]. 新中国外交风云: 第4辑 [C].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 [3] Walter Laff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92*, 7th ed., McGraw-Hill, Inc., 1993.
- [4]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5]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
- [6]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 [7] 毛泽东自述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8] Richard P. Stebbins and Elaine P. Adam, eds.,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7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 [9] 张小明. 冷战及其遗产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10] 姜长斌. 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 [11]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M]. 金光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12] G. W. Choudhury, *China in World Affair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RC Since 1970*, Westview Press, 1982.
- [13] 邢广程. 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4分册)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14] Allen S. Whiting,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the 1980s", in Richard A. Melanson, ed., *Neither Cold War nor Detente?*,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2.
- [15] 冬梅.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 7—1981. 7)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82.
- [16] 杨生茂. 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作者简介: 胡晓丽(1975— )女, 历史学博士, 山东交通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副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 裴传永